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性通識

本性權利與道德爭議

陳效能 著

社會科學通識叢書

主編：馬傑偉、吳俊雄

本性權利與道德爭議
性通識

陳效能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1

主編：馬傑偉、吳俊雄
社會科學通識叢書

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叢刊第八十九號

性通識：本性權利與道德爭議
Sex in General: Rights and Controversies

作者：陳效能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刷：卓利製作公司

版次：二零一一年四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 978-962-441-589-6

© 香港中文大學 2011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今天的社會，結構複雜多變，文化風貌混雜全球與本土因素。理解和分析自己處身的立足點，尋找工作與生活的方向，是迫切又貼身的問題。教育界近年提倡通識教育就是希望回應時代的需要，讓學生及一般公眾，掌握日常資訊、瞭解社會脈搏、思索文化淵源。重視通識有助我們在變化多端的生活環境中，觸類旁通，因時制宜，成為通達的公民。

通識教育涵蓋的範圍極廣，包括天文地理、自然科學、文史哲及社會科學，尤以貼近現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層面的知識較符合課程旨趣。在香港的教育環境中，文科及理科較為公眾所理解，一般學生都熟知數理化、文史哲等學科的性質及其大概內容。然而，對於社會科學這個與通識關係密切的範疇，在學生與一般公眾心目中的印象卻比較模糊，對當中的科際分野亦未必能清楚掌握。一般印象也許以為心理學等於心靈雞湯、社會工作就是排難解紛、傳播學只是拍電影和報道新聞、地理不出考察濕地泥灘、政治學近乎議事論事、社會學則似是集成成的萬用學科。

除了對各社會學科的內容印象模糊之外，更需正視的問題是，公眾對社會科學知識的性質，存有不少誤解，或視之為自然科學的恆常規律、或貶之為任意表述的個人觀點。在這篇序言中，我希望以自身的經歷，釐清大家對社會科學的一些誤解。

社會科學 vs. 自然科學

我的學術旅程，是在成長期間跌跌撞撞地輾轉走過自然科學、哲學、神學和傳播學，最後終覓得社會科學為職志的過程。

我在中學念理科，考進香港中文大學的生物系。那時的我喜歡造標本，把各種蝴蝶歸納分類，整齊齊，井然有序。自然科學的長處，是掌握物理世界的規律，歸納出普遍適用的法則，然後按此預測研究對象的變化，知道在特定條件下， x 變項加 y 變項會產生 z 後果。

但在修讀生物學的時候，卻漸漸發現自然科學未能解答我的困惑。那時，表面上年青人有很多發展機會，但同時殖民地制度也衍生了很多社會問題，自然科學能透過理性瞭解物理世界的秩序，卻無法把個人與社會種種複雜難解的矛盾與衝突歸納成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公式。這正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之處。

社會科學以有思想文化的人類和他們聚居的社會為研究對象。與其他動物或許相異，人類文明是由文化累積而成，因著時地習慣的差異，多變而各具社會脈絡的特殊性。早期的社會學家也曾希望社會學知識能借用自然科學的模式，發展出客觀準確、通用於不同社會的規律，但經過多年嘗試和積累不少失敗的教訓後，大家漸漸發覺此路不通。社會科學要研討的問題內容實在複雜——文化因素比重較少的問題，例如基於生理原則的心理反應、慣常的社交距離、經濟學的簡單供求原理，或許還有普遍的通則可尋；可是其他社會文化課題，例如失序與自殺、社會的輿論議程、性與暴力的成因、選舉投票的策略分析等，雖隱然有迹可尋，然而成因複雜，實在不能如科學實驗般，可清楚控制因素的加入或減少，從而確定彼此間如何相互影響。

自然科學能反覆驗證，測試出準確的研究成果，但社會科學只能盡力精益求精，根據現有的資料進行分析，盡量達致概括性的結論。不過，每當新的發展出現，或有新的因素加入，或轉一個時空、換一種社會和文化，當中的人與事，各種因素的互動模

式，均會相應有所變化。換言之，社會科學對文化社會特殊性的敏感，與在不同社會中也普遍通用的自然科學知識，大大不同。

社會科學 vs. 人文學科

修讀生物系期間，為解答人生的意義，我選讀了哲學概論和神學思想史，興趣轉向研究典籍（如聖經），詮釋它們在今天的意義。我的心願是在學習知識的同時，也可以知識影響別人。如盲頭蒼蠅亂飛亂碰中，突然發現：神學不就可以同時滿足兩者嗎？於是，那年我下了人生中一個很重要的決定：離開中文大學，轉到神學院修讀神學。

神學屬於人文學科範疇。人文學科關心文化、宗教、哲學、文學、歷史，宏觀地著眼於由人類社會歷代思辨與文化創造而累積下來的價值與思想，並關心這些文化遺產在當下所產生的意義。

人文知識講求詮釋，與社會科學有很多相通之處，譬如兩者均討論詩詞歌賦、歷史傳統、建築風格等人文議題，但著眼點卻有所不同。人文學科關心文本、文物、經典著述；社會科學則關心這些文化詮釋如何具體地在日常生活、集體禮儀、社會制度中發生作用。人文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雖不能截然區分，但大體而言，重點有別。前者較集中於文學、文本，而後者則會把意義的解釋置於實證的社會處境中討論，所以社會科學傾向採用問卷調查、訪問、田野考察等研究方法。

簡單而言，兩種知識體系都會考察某一社群、某一組織、某一族群對社會生活各個範疇（例如性、性別、婚姻、集體認同、社會分層等）所投射的價值、意義與實踐，不過，社會科學較側重以實證數據作詮釋的基礎。

取得神學學位後，我卻沒有成為牧師。本來我就只是為了解答個人的疑惑而進入神學院，修讀後更肯定神學的形而上性質。自己確信的愈來愈少、懷疑的愈來愈多，覺得未能單憑對經典詮

釋的再詮釋，說服自己堅定地傳道，並同時說服別人相信我的信仰。神學畢業卻不做傳道工作，教會群體給了我不少壓力，我更因此感到在社會與個人之間，價值與信念往往產生極為複雜多變的作用。

就意義詮釋與社會現實的關係，在眾多觀點之中，社會科學的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較能令我在理解、解讀意義的同時，也關心和介入社會。實證主義（positivism）強調社會現實的客觀存在，並有規律運作其中。研究者可以記錄、分析這個實證世界，從中發現其運作規律，並將之化為社會科學知識。

後實證主義的分別在於：既肯定社會現實的客觀存在，但與此同時，也引入另一個理念，就是肯定身處社會現實的個人與群體，均會主動活躍地詮釋，賦予生活各層面不同而多變的文化意義。因此，社會客觀現實並非恆常固定，研究者只能盡量貼近正在變動中的現實，而無法像自然科學研究者那樣全面掌握研究對象並把「真實」收入理論之中。後實證（post-positivist）的分析進路，姑且簡化如下：既努力收集及分析實證數據，亦關心當中意義詮釋的多元變化。

社會科學與社會改革

當年在神學院的天台靜思，我知道自己最終的心願是希望與別人分享知識、參與社會。在神學院畢業後，因為喜歡創作，我再到美國修讀電影。回來後先後加入突破、無線電視、亞洲電視和香港電台從事幕後工作。那時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手執導演筒或當編劇，製作與社會實況有關的節目，關懷社會、亦介入社會。在香港電台的時候，快30歲的我兼讀中文大學的傳播學碩士，那時才真正決定將來要在學術方面發展。也許社會科學最吸引我的，就是強調實證數據、文化特殊性，及學術分析的反思性（reflexivity）。

著名的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現代社

會的發展軌迹，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馬克思的共產思想、經濟學家對市場運作的論述、社會機構的工具理性管理，都左右著社會的建構與改造。社會科學不是「客觀」地發現普及定律，而是透過考察社會而生產知識；知識成熟後普及於世，若有機會取得社會的局部共識或被權貴採納，便往往「干擾」社會現有的結構，進而修改、創造或促成新的社會現實。

換言之，社會科學的反思性不是簡單的思辨、反映、記錄，也不僅是抽象思考，而是觀察考究、蒐集數據、分析整理、生產知識；而在知識介入社會之後，社會的形勢有所改變，研究者所觀察探討的社會現實亦變得與以前不同，需要進一步補充、修正。新產生的社會知識，又在社會場景中產生新的作用。

宏觀來看，對性別、身份認同、貧窮、文化保育、全球化、輿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若真能指陳社會實際的處境，亦會改變這些理論所指向的現實。因此，社會科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的知識內容是一個不停修正、參照、對比、觀察的過程。必須申明：這不表示社會科學的案例轉眼即過時；過去的有效案例，可成為今天的參照和未來作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跨學科的社會分析

也許大家不會感到意外，以我背景的混雜，在英國修讀傳播學博士的時候，對學科的分工其實有一種反叛心理。幸好那時的老師，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者柯倫（James Curran）和文化研究學者莫利（David Morley）給我的自由度很大，亦影響了我跨學科的研究傾向。

近年社會科學跨學科的趨勢漸漸明顯。上世紀曾有一段頗長時間，社會科學專注於發展專業化與專門化的科際界線。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傳播學等學科，積極建立專業團體，在大學中鞏固各自的學術地盤。然而，近年社會流動性愈來愈大，各領域互相結連，漸難以單一學科的角度深入把握社會議題。譬如

貧窮、身份認同、文化保育等問題中就有社會學、社會工作、經濟學、傳播學、心理學、人文學、人類學等元素，很難歸入單一的學科來處理。

回港後開展研究時，我雖在傳播學院任職，但也體會到如果僅只分析媒體，或嫌過份單薄，無法處理社會的複雜問題。所以在理論上，我對社會學家紀登斯和鮑曼（Zygmunt Bauman）的著作最感興趣，在學科上亦深受城市地理學和社會理論的影響。近十年則傾向以民族誌（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走入社會現場，近距離觀察，盡量貼近社會現實。

跨學科的要求，其實也是近年倡議通識教育的其中一個原因。不過，跨學科的思考方法並不容易，因為各專業已發展出各自豐富的文獻與理論傳統，跟隨個別專業的進路去分析問題較為輕鬆安穩；而跨學科意味思考者必須涉獵各種不同的理論，並很容易陷入斷章取義的錯誤中。我便不時走出傳播學，在別人的「地盤」尋找概念，常有外行人的不安感。

對於跨學科常遇到的「外行人」問題，很難有周全的解決方法。我的建議是，以研究課題為本，集中於一個有研究價值的課題，搞清楚背後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這牽涉如何問、問甚麼、為何問的環節。然後不避學科門派，在相關學科中追尋現有案例，借用相關概念進行分析。這是我個人的經驗之談，也是通識研究的其中一個特性。這個系列的編輯方針，亦著眼於社會科學強調處境、詮釋、實證、反思，以及跨學科等特性，盡量展現通識思考的門路。

我在1977年考進香港大學的社會科學院，第一個印象是學科紛陳，當中有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工作、社會學和統計學。我在中學時讀過類似經濟學的EPA（經濟及公共事務），雖然成績好，但不喜歡，所以在大學時沒有選修。選修過心理學和政治學，覺得前者太傾向於討論個人，而那時候教政治學的教授殖民地氣息過重，因此我主要修讀了社會學和社會工作。

進大學前，我已開始做義工。入大學後最掛心的始終是校園外的社會。那時很少正經讀書，我當了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總編，一天到晚窩在編輯部，今天回看，當年唯一做的，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本地化。有一段時期，我曾經以為社會科學應該像自然科學一般，事事井井有條；但因為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所以很早就認清楚社會脈絡和歷史背景的重要。自那時開始，便喜歡看歷史，也愛看平民生活的研究，而這正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之處。

1980年，我成為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當時中國剛開始經濟改革，於是打算進內地做實地研究。往後過程誤打誤撞，本來打算研究工人民主，做關於工人階級的質性研究，想走入工廠訪問工人，但大陸才剛開放，要找工人作深入訪問並不容易，於是論文變為研究《人民日報》的文本分析。

我在1982年到英國讀博士，依然關心工人階級，但轉為研究在戴卓爾（Margaret H. Thatcher）統治下工人階級的集體認同和團隊文化。我的研究方法是民族誌（ethnography），研究過程著重與人面對面溝通交流。那時想透過工人領袖（shop steward）找普通工人，最後卻發覺前者比較容易接觸，而且因為他們身為領袖，常常要講話，思想已經整理過，訪問起來容易直達要旨。後來讀多了書，更確認他們對英國社會的走勢舉足輕重。於是，整個研究重心從工人轉向工人領袖。訪問時，對方常常說個不停，不時夾雜地區方言。我邊訪問邊錄音，然後回家反覆細聽，努力加上想像，總算能夠明白七、八成。

民族誌著重詮釋，但其實從訪問到分析是一個交費學習的過程。做訪問要做得好，需要經驗，知道甚麼時候問，甚麼時候停；詮釋理解的過程，也要有人生閱歷才可以分析到位。回看我那時的論文，真的做得很粗疏。現在我的研究理論較少，但做得比較厚。我喜歡的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一直強調，民族誌重點在於厚度（thickness）。厚度指的是對細節的觀察和描寫，優勢是理論較少，人的故事先行，在講故事的過程會慢慢見到人生的轉折和複雜，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如果以理論先行，太想以故事來引證理論，有時看了最初的十頁已經知道結局如何。

做不同的研究要用不同的方法。數人頭有數人頭的方法，研究人心有研究人心的方法。問卷調查之類的大規模分析能夠找到社會的大致取向，民族誌這類仔細的詮釋，可以細膩地探討人到底在想甚麼。兩者成敗的關鍵同樣在於嚴謹的態度和對細節的著重。

在英國做了三年研究後，回到香港在理工學院一面教社會學一面趕論文，最後花了三年時間才在1988年完成。從前讀書的時候以馬克思主義傳統為主，但教書的時候，常常提醒自己，不可以一言獨大，要多元，要尊重你的對手。再加上當時理工學院的學生背景各異，有些強調理論，有些著重實踐，所以要用心將學

術世界的各種聲音梳理出一個細緻的說法，即使這些聲音本來未必表達得如此清晰。

在求學期間，我多留心源自馬克思和韋伯（Max Weber）的學術傳統，但教書時開始重讀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和帕森士（Talcott Parsons）那類傾向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的社會學派著作，才發覺原文並非我在讀書時所想像的那麼不濟。來自馬克思傳統的社會學擅長探討社會不平等，研究階級、性別、全球化，對分析權力很有幫助，但在面對感情、美藝和道德的時候就難以應對。譬如討論音樂時，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認為所謂古典音樂的「品味」（taste）是階級分界策略的產物，但他對音樂本身和人類感情的互動，卻未有觸及。美國根源於象徵互動主義（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文化社會學者，如貝克（Howard Becker）的著作《藝術的世界》（*Art Worlds*），就能夠對這方面加以補足。

我的跨學科傾向，開始於馬克思主義對大結構的分析，接上後來社會科學界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強調結構與文化間的互動關係，再結合對生活的關注。於是，我既留意宏大的全球化現象，也對微觀的民間習慣感興趣；在方法上，我則堅持要有厚度。我也堅持做社會分析要有人文主義的態度，站在弱勢者的一邊，揭示人文關係，批判權力集中和資本主義的惡習。

除多元開放和兼容並蓄之外，我也強調要瞭解香港的實況和本土特性。香港發展的經驗是一套獨特的港式資本主義，它由以下三種元素結合：（一）沒有經歷過福特主義（Fordism）年代的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在美國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仍然強調大規模生產、大型官僚架構的時候，香港已重視靈活有彈性的生產模式。（二）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殖民性——政治上壓抑，文化範疇卻傾向開放。（三）中國傳統的影響——二次大戰後南來的兩類內地移民各有風格，一類是來自上海的海派，見過世面；另一類是位處邊陲的嶺南文化，獨立、傾向實際、不重大義。這些元素結合起來，形構了香港的特殊處境。

本系列的書，探討媒介與身份認同、普及文化、文化保育、性與性別、貧窮等大問題。我們的編輯方針是著重本土性，有歷史視野，從具備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之上展開討論。本系列在分析這些通識主題的時候，我們希望展示社會科學的特性，讓讀者不單認知各種相關內容，亦掌握一套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回歸前夕，大家紛紛思考到底香港是甚麼，香港人又是甚麼，當時對身份認同的困惑、對香港前途的思考，也是引發今天重視通識的開始。

性通識

本性權利與道德爭議

陳效能

目錄

總序一	社會科學與通識教育 馬傑偉	vii
總序二	我的本土方法：社會分析的兼容與厚度 吳俊雄 ..	xiii
導言	1
第一章	性與人性	13
第二章	性的性別與性的正常性	31
第三章	性的商品化，傳媒中的性	53
第四章	性工作	69
第五章	性暴力	85
第六章	性教育	111
第七章	性權力與性權利	125
第八章	總結	141
參考書目	145
通識系列編後語	馬傑偉 吳俊雄	159
索引	161

性跟其他的社會科學研究題目如文化、經濟、政治等有點不同——我們總覺得性是私事，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提出來也可能會令部份人感到有點不安。研究普及文化、政制發展屬於比較「正規」的學術議題，但若跟其他人說你是研究女性性高潮的社會歷史、自慰的社會建構，以及同性戀（homosexual）者的安全性行為模式，可不是所有親友都會對你肯定和鼓勵。公開表示對性有興趣——指的當然是學術上的興趣——會被社會標籤化（stigmatize），也可能惹人猜度你的私生活存在種種問題（她研究性高潮，是否因為自己不能達到？他研究同性戀，是否自己也是個同性戀者？他研究淫業，難道此君經常嫖妓？……）。在香港這個表面上性開放的社會，談性怎能不小心一點？

事實上，香港是一個對性十分保守的社會。市民及政府皆對性小心翼翼，大驚小怪，動輒便要禁、要封、要送檢。但同時，性在我們的社會裏卻又隨處可見。經過報攤瞥眼一看，無論電腦、「八卦」或是美容雜誌，都慣性地以性感美女作封面；公共交通工具上，乘客肆無忌憚地翻閱報章風月版介紹最新骨場佳麗技術如何了得；「八卦」雜誌慣性地對名媛女星的身材評頭品足，認真仔細檢視疑似露點露底的照片更屬指定動作。鬧市中、地鐵裏，我們見到「偉哥」（Viagra）的露骨廣告；在巴士上的廣告，我們見到穿著性感內衣的模特兒挺胸收腹的撩人體態；電視熒幕充斥著男女調情的性感影像和聲音；雜誌廣告裏用以促銷飲品、衣飾手

袋、電子產品、稅務貸款等各類商品的多是型男索女；互聯網上的性資訊就更如水銀瀉地，可見「性」多麼有吸引力。現代社會對性的態度似乎有點精神分裂：一方面，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看到聽到碰到和性有關的影像、文字、聲音和談話；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時時刻刻感受到性受著社會嚴厲的制約和監管。以下以幾個例子說明上述現象和它們所帶出的議題。

香港社會的一些性議題

例子一：性文化節

香港性教育會自2006年開始每年舉辦「香港性文化節」。活動的主旨是「喚起市民對性教育及性文化的關注，從而充實、促進本地及鄰近地區的性健康教育發展，讓市民認識到性的各範疇及不同性觀念，求同存異，互相體諒，和諧共處。」¹ 2008年底舉辦的「港澳性文化節」有不少團體參加，包括香港十分一會、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紫藤、午夜藍等。為期數日的活動有話劇、講座、辯論比賽等多項節目。眾多活動中，最受廣泛報道的卻是表面上好像跟性文化應該沒甚麼關係——由人體藝術協會所舉辦的人體繪畫藝術示範，這項活動吸引了共約1,500名市民。大部份市民並非對人體寫生這門藝術特別有興趣，他們最想看到的其實是裸體模特兒在中環鬧市任由觀看的奇景而已。可惜警方卻大煞風景，要求在場的模特兒用手腳及膠紙遮掩重要部位，又不容許未成年人士進場。但不少市民並未因此而失去興趣，依然耐心排隊一小時輪候參觀。

如果你當天路過，你會排隊嗎？為甚麼？你對那些排隊的市民又有甚麼看法？

另外吸引傳媒廣泛報道的，還有當時的香港區天主教樞機陳

1. 詳見第三屆香港性文化節網頁 (<http://www.hksea.org/fest08.html>)。

日君對性文化節的言論。他認為性文化節是「掛羊頭賣狗肉」，活動性質並非以教育為本，只是商業推廣。他表示：「有些人說我們將人生最美好的事[性愛]講得很醜陋，實際上我們並不反對性愛，只是我們所說的並非單純的肉體的結合，而是完全的結合，我們不應只滿足本能的渴求。」（《經濟日報》，2008）他接著說：「當性成了商品，就會變得沒有尊嚴，世界上很多性開放的地方都發生了不少淒涼事，性活動變成有錢人剝削窮人的行為。」陳日君這短短幾句話正道出了不少人的心聲：性的商品化令本來是美好自然的事變得醜惡，突出人性悲哀的一面，所以性絕對有規管的需要。當天更有20多名基督徒到場，舉起橫額，大叫口號：「港男港女要錫身，貞潔助你愛一生！」性文化節不單被本地宗教領袖狠批，連跟陳日君南轅北轍的本地才子陶傑亦嘲笑性文化節為「性淫化節」。他認為：「一個成熟的社會，對於性，沒有甚麼大驚小怪，國際都市如紐約、倫敦、巴黎，都沒有甚麼『性文化節』，只有永遠用鬼鬼祟祟的眼光窺看人體的蠢社會，為了要顯示它的『開放』，才會舉辦甚麼『性文化節』。」（《蘋果日報》，2008a）另外，當天又有團體派發有關性病的小冊子，卻被警方阻撓，認為小冊子印有性器官的圖片，屬不雅物品。主辦團體的發言人和嘉賓（如白韻琴）都認為警方過份緊張。

你認為性文化節是多餘，還是必要的？以藝術之名在公眾地方裸露身體，應否受警方干預？性開放是否如陳日君所說的必然導致淒涼的事發生？

例子二：疑似藝人淫照事件

大家還記得這在2008年轟動華人社會的艷照門事件嗎？就算你沒有在網上或電郵附件看過有關的圖片和短片，也應該會見過報章雜誌上打了格子的轉載和報道吧？形象清純的年輕女藝人被大眾看到她們的裸體、性器官的大特寫、性興奮、自摸、口交、在床上和男人做愛的樣子；當然，還有男藝人陽具的大特寫等等。涉及的藝人因為這事件全都受到極大打擊，嚴重影響她/他